



大家小书
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《红楼梦》探源

吴世昌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013029770



I207.411
172

《红楼梦》探源

吴世昌 著



I207.411
172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858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红楼梦》探源 / 吴世昌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 2013. 1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084 - 0

I. ①红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4327 号

责任编辑 莫常红

责任印制 李 巍

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

· 大家小书 ·

《红楼梦》探源

《HONGLOU MENG》TANYUAN

吴世昌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 京 出 版 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195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0 - 09084 - 0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紅樓夢揮源卷五書成記以五絕

一往深情到不虛，千秋偉業託華胥。
原知此夢人多有，若箇醒來月若書。

朱墨淋漓滿紙愁，幾番把恨注紅樓。
脂膏已是多情種，可是前身舊石頭。

風月瑩華記感時，欲將寶鑑警頑痴。
棠村小序分明在，紅夢寧家告未知。

獲稿迷亡不可尋，枉高欲補見深心。
將傾大厦終難挽，何必望恩說到今。

大義消沉二百年，高潮爭論薄雲天。
張皇告渺誠餘事，莫道文人作鄭箋。

歲在癸丑大淵獻臘至后五日

海寧吳世昌作于英國牛津大學并書

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

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《〈红楼梦〉探源》及其作者吴世昌先生

魏 飏

《〈红楼梦〉探源》是一本考证书——考证《红楼梦》的本来面目。“研红”本来不是吴世昌先生涉猎的领域。他长于训诂，雅爱词学，20世纪30年代讲授文史，40年代兼事政论，1947年至1961年应聘在牛津大学执教。1954年，开展了一个名叫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批判”的运动，由批判俞平伯先生而延伸到批判胡适先生，旨在反对一切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，特别反对用考证来鉴别史料的真伪。反对的理由非常强大有力，因为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，不需要其他知识。既然考证不能为这两种斗争效劳，就不配在知识的领域中存在。

世昌先生对《红楼梦》的考证，开始于这个批判运动奏凯之后。他以讲学之暇，穷数年之功，运用他精通的考证学而不是他所不熟悉的主义，就当时可能见到的抄本和相关资料，爬罗剔抉，分析比较，完成了一部考

证报告《〈红楼梦〉探源》（后简称《探源》）。此书按照他所考察的五个步骤分为五卷，即抄本探源、评者探源、作者探源、本书探源和续书探源。书以英文写成，196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。《探源》的中文版，先生生前翻译了一半，未竟的部分是我勉为其难受命补译的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面世。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，是《探源》的节本，它略去了基础性研究（对抄本、评语的对比分析）部分，直接进入对评者、作者、全书故事结构的考察。这样读起来比较有趣，不枯燥，但因此也难以了解作者治学的路径。读完此书，如有兴趣进一步与作者一同“探源”，不妨检阅《吴世昌学术文丛·红楼探源》（北京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《探源》的第一位读者，是把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九歌》和《西游记》译成英文的汉学大师亚瑟·卫莱爵士（Arthur Waley, 1889—1966）。他欣然作序，说自己四十年来，每读《红楼梦》，常有感于其成书的种种问题不可得解：“吴先生此编解决了我多年所望解决的问题，在明白和割切两方面，较之我读过的其他论著，都远擅胜场。”

本来许多人把《红楼梦》当作自传体小说。经过考证，《探源》有根有据地指出：贾宝玉的原型不是作者曹

雪芹，而是少年时代的脂砚斋。评者脂砚斋，既不是曹雪芹，也不是贾宝玉的表妹史湘云；他是作者的一位尊长，很可能是作者的叔父。《红楼梦》写了一家贵族如日中天时的显赫，也写了它败落后的凄凉。原书不是未完成的残稿，而是有头有尾的全本，只是没有最后写定，尚在不断征询意见进行修改之中，又在流传中不幸损缺而已。全书本来不是一百二十回，最初可能是一百回，后来扩充到一百一十回左右。在作者死后的一次传阅中，八十回以后的文稿（大约有三十回之多）不明不白地丢失了。小说所以长期局限在亲友和赞助者的小圈子中传阅，除了没有定稿，还和当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统治手段即文字狱有关，因为小说中有朝廷所不愿意让大家看到的“关碍语”。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，是作者去世二十多年后由高鹗补续的。高鹗很可能看到过原书八十回以后的部分回目和部分内容，不过他的续作与作者和评者在前文、眉批和夹注中的明喻暗示很有出入。为了配合后四十回，高鹗还改动了前八十回的某些文字。幸亏作者和评者的提示是不可磨灭的，它为读者提供了凄美而又朦胧的想象空间，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缕缕不绝的遐思。

粗疏的概述绝对不可能表达《探源》的结论于万一。

我想指出的是，先生研究学问，求真崇实，坚持搜集证据，鉴别证据，从证据出发；不凭猜度，或灵感，或趣味，或风向，去作出肯定与否定的结论。世昌先生在经历迷宫追本溯源的同时，饱尝着探索者的艰辛与乐趣。我们在阅读中，随他一起，上下求索，庶几也是一种分享。

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批判”运动扫荡的中心是文史界，不少学者因此只好改变治学的道路，转而从事文史主题的社会性、人民性、革命性、局限性之类的推导；吴世昌先生则我行我素，老而弥坚。为什么？我问过先生，先生的回答很平淡：“各尽所能。”他说，各方面的研究，都是需要的；但上层建筑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殿堂；他是“小工”，应该做点清理地基打夯铺砖之类的基础性工作。

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请允许我补充两点。第一点，可能和他做人的原则有关。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，愿意用自己的脑思考，自己的嘴说话，不懂得赶浪头，凑热闹。记得1966年上半年，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炮声已经隆隆，中央某部开座谈会，吴世昌先生在会上依然泰然自若，坐而论道，侃侃而谈“清官总比贪官好”。他把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命名为“文海战术”，并且执着地认为，“文海战术”无助于解决学术上的是非。“文革”中，他奉命到五七干校劳动，后来接到通知回

京，军代表要大家畅谈收获，他一言不发。点名要他发言时，他说：“五七干校没有什么好——要我们回去，不正说明问题了吗？”后来刘再复先生以“正声满学院”相挽，良有以也。

第二点，可能和考证的特点有关。考证的兴起，和怀疑同源。魏晋的怀疑主义，实质是不合作，表现为谈空说玄。唐宋元明，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应举做官，几乎谈不上怀疑和考证。理学流行，主要是“代圣人立言”。清人入关后，相当一段时间，一部分汉族读书人不屑参加科举，开辟了考证即朴学的新天地。在理学的时代，人们习惯于高谈是非而不问所以然；朴学则不然，要打破砂锅“问”到底，哪怕是天经地义，也得问它个水落石出。比较起来，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中最接近于现代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学派。他们的共同准则是“拿出证据来”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，如胡适先生、顾颉刚先生，在整理国故方面，走的就是这样一条“怀疑·考证·创新”的路。这也正是世昌先生性之所近的治学之路。

1930年，世昌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二年级，发表了一篇论文：《释〈书〉、〈诗〉之“诞”》。他不满足于两千年来被奉为主臬的汉儒的解释，独辟蹊径，对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中的全部33个“诞”字逐一解剖，找到了答案：“诞”

者，“当”也，“其”也。理由“如此平常”^①：“诞”和“当”同纽，“当”和“其”互训。拿这把钥匙去破解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中的33个“诞”字，27个迎刃而解。那无解的6个字，恰恰都在所谓古文《尚书》之中，从而为证实古文《尚书》的伪造提供了新的铁证。原来是一些读不懂“诞”字的儒生，一方面把“诞”误解为“大”，另一方面又本着这一误解去伪造古经，露出了自己的马脚。这篇论文以及后来继续探讨古籍语词的一系列论文，奠定了吴世昌在国际汉学界的声誉。的确，考证之于吴世昌，正如水之于鱼。后来，是救亡图存，共赴国难，逼他走出书斋，认识了储安平诸君子，一时成了政论家，发表了《中国文化和现代化问题》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时评。1962年回国，他进一步考证《红楼梦》，依据新材料，修正一些原有结论，进行新的探索，用中文写了多篇论文，结集为《红楼梦探源外编》等书。

我有幸亲承警效，断断续续，凡四十年，惜乎资质鲁钝，难于登堂入室。现在谨借北京出版社把《探源》（节本）编入“大家小书”丛书之机，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，贡献如上，或许，对年轻的读者诸君可能有所启发？

① 先生曾自撰一联，“学问只如此，真理极平常”，置诸案前。

序

吴世昌先生嘱我为《〈红楼梦〉探源》写一小序。我是《红楼梦》的一名读者，四十年来，每读是书，常有感于其成书的种种问题不可得解。吴先生此编对许多问题作了透彻系统的研究。我至爱这部 18 世纪的中国小说，但对中国学界近三十年论红之作涉猎未广。吴先生此书解决了我多年所望解决的问题，在明白和剖切两方面，较之我读过的其他论著，我认为都远擅胜场。比如，“脂砚斋”究属何许人也？《红楼梦》脱稿不久，他就加以评注，透出成书的许多消息。吴先生提出坚实的论据，证明脂砚是著者的叔父。再如，书未完稿而作者谢世，我自然想多多知道一些续著与原著的关系。我认为吴先生在这方面也得出了有价值的新结论。

吴先生此书之所以弥足珍贵，是因为时下在中国流行的，乃是对艺术作品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研究。研究这种关系自有其价值，何况过去全然忽略了这个领域。但是，其他领域，诸如作者生平与作品的关系，作者的生活经验升华进入作品的过程等，也自有其研究的天地。吴先生这部著作，通过爬罗剔抉的劳作，达到明白晓畅的结论，是后一学派的典型。

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语言的统一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。

吴先生断定这种统一实出于二人之笔，正与拙见相合。高本汉在《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》第二十四期上撰文说：除非他俩来自中国同一地区，否则不可思议。其实他俩并非高本汉所说的“老乡”：曹霁来自南京，高鹗来自满洲。他们所以使用大体统一的语言，显然基于他们同属归化满旗的上层汉人这一事实。纯净高雅的北京话，是他们共同隶属的社会环境所使用的共同语言。高本汉说他俩非得拿出“闻所未闻的机灵劲儿”才能驾驭这一类型的口语，则未见佐证。说实在的，倘若曹霁和高鹗舍此而改用别的语言，反倒“神”了。

亚瑟·卫莱^①

^① 亚瑟·卫莱（Arthur Waley 1889—1966），英国著名诗人，翻译家，汉学权威。翻译过许多中国诗，多次出版译诗集。剑桥大学荣誉院士，不列颠学院院士，1956年授予勋爵。又：此序及导言均由魏畅译。——编者注

导 言

发现曹霭小说的两部 18 世纪手抄本的消息，是在 1927 年和 1933 年公布的。两部抄本上都有脂砚斋的评语。第一部十六回，第二部七十八回，都以“石头记”为题，亦即《红楼梦》的旧名。到了 1954 年，这两部抄本以及其他抄本上的评语才辑录成书，出版了。至于七十八回抄本的影印，则是 1955 年的事。这些出版物使我确立了工作目标：作为第一步，先把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彻底研究清楚，如抄本的来源和年代，抄本上的评语和注解，这些评注的写作时间和评注者，等等，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地。为了在七十八回本和至今尚未公之于众的十六回本^①之间进行对照，我不得不用《脂砚斋红楼梦辑评》^②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资料，自行重构十六回抄本的面貌。我的这一阶段的工作，记在本书前三卷^③中，计

① 这篇导言写于 1960 年 4 月，一年后，即 1961 年，胡适博士收藏的十六回残本脂评《石头记》开始在台湾和香港发行。

② 俞平伯辑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 年版。

③ 收入“大家小书”系列的《〈红楼梦〉探源》为作者著述全本之摘选本，此处“前三卷”、“十一章”，以及后文“附录三”，均指全本，读者可参“吴世昌学术文丛”之《红楼探源》（除包含全本之外，还收录了一些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）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。后文中称《红楼探源》者，即指此书。

十一章，完稿于1956年。

一组问题的解决，常常引起另一组始料所不及的新问题，同时也为解决诸如原著和续作，作者和续者等悬而未决的老问题带来了新的启发。这使我认识到，除非对《红楼梦》进行全面的研究，否则，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结论。这就必须占有目前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，进行详尽的和综合的研究。好在1954年至1956年中国进行关于《红楼梦》问题的讨论之后，出版了许多曹霁友人和同时代人的著作，而且大多是首次刊行。很多朋友帮我搜集到了必要的资料，其中有中国学术刊物上新发表的有关论文，使我得以在1957年至1958年继续进行后两卷的写作。根据1958年后得到的新资料，我增写了《附录三》，并在1959年对前三卷作了一些修改。

在西方大学里，《红楼梦》一直是讲授现代汉语的重要教科书。因为它有较多的西方语种的新译本在陆续出版，也因为它在西方同在亚洲一样很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爱读，它无疑会取代某些古汉语课程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教材。可惜迄今还没有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。希望我的尝试性的工作在目前能多少填补一点空白。不过，既然想要解决一系列的复杂问题，有时就难免讨论得详细周密一些，否则无从得出明白的结论。本书最后一章是各卷的提要 and 总结，供查阅之用。我希望这些提要对于准备继续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者也能有点用处，而不是多余的。

在研究过程中，我不得不澄清一些错误的概念，它们屡

屡出现在讨论《红楼梦》问题的流行出版物中。看来，这些错误的概念恰好是影响研究者得出正确结论的主要障碍。例如，前面提到的那两部手抄本，一直被称为“甲戌（1754）本”和“庚辰（1760）本”。我不用这种容易误导的名称，径直称之为“甲本”、“丙本”^①，因为他们显然是甲戌、庚辰年之后很久的过录本。“甲戌本”、“庚辰本”的叫法始创于胡适博士，其实，在“甲戌（1754）年”的底本上标着“甲午（1774）”，而“庚辰（1760）本”有四种不同的底本，其中记下的最后年份却是“丁亥（1767）”。这些不合史实的标签由有“历史癖”的学者加以传播，对尔后的研究工作起了一种催眠似的作用。1950年以来，发现了更多的早年抄本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，但也仿此被贴上了标签，如“己卯（1759）本”、“甲辰（1784）本”、“己酉（1789）本”等。较为严肃的论文把它们称为“某某年本的过录本”，但是，即使如此小心翼翼，仍难免避免误导，因为连胡博士“甲戌本”的底本也不应断为甲戌，同样，“庚辰本”的四种底本也不应一概断为“庚辰”。不太仔细的人一谈到“甲戌本”，自然而然地往甲戌年（1754）上去想，这样，在涉及与抄本年代有关的其他各种问题上，很容易顺着这条思路滑下去而不能自持。无怪乎直到1957年，仍有学者把“甲

① “甲本”、“丙本”是作者在英文本中为英语读者设计的“V₁”、“V₃”的中文译名。考虑到用“甲”、“丙”等天干名称仍易引起误解，作者后来把“甲戌本”称为“脂残本”，把“庚辰本”称为“脂京本”。因此，在翻译正文时，一律采用作者晚年审定的文本名称。——译者注